

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与 整个亚洲世界的联动

——以万历二十年明朝“借兵暹罗”征讨日本议案为例

郑洁西*

一 前言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明朝在军事、政治方面介入半岛冲突，整个东亚世界的局势发生巨大动荡。这场以明朝、朝鲜、日本三个主要东亚国家为参战方的战争，作为东亚世界的一场重大“国际事件”，历来备受学人瞩目。不过，受到战争影响的国家并不仅仅局限于明朝、朝鲜、日本这三个国家，以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国际事件”，则有可能会发现，其所引起的整个已知世界的联动，恐怕比以往的想象还要复杂。

譬如，这场战争影响到了接壤朝鲜、在当时和朝鲜同样向明朝朝贡，但后来却以“大清”为国号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东北夷”女真族。万历二十年六月，侵朝日军第二军的加藤清正部为了探寻进击明朝的军事路线而深入女真部落的领地图们江下游（日方文献称之为“兀良哈”），与当地的女真人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①另一方面，当时的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即

*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讲师。

① 日本学者池内宏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这一“兀良哈征伐”事件作过专门研究，参见池内宏《文禄庆長の役》别编第一，东洋文库，1936，第233~252页。后来的学者对“兀良哈征伐”事件也多有提及，如北岛万次：《加藤清正：朝鲜侵略の実像》，吉川弘文馆，2007，第32~34页。

后来的清太祖)亦曾分别于万历二十年和万历二十五年(1597)两次向明廷请求出兵进入朝境抗击日本侵略军而未果。^①

又如,位于台湾岛东北和日本九州岛西南之间的琉球国,处于明朝和日本两大对立国的地理和政治夹缝之中,它虽然没有被直接卷入战争,但是,作为明、日两国之间的海上要冲,它与这两个交战方都有着极为频繁的人员往来和信息流通。日本的丰臣秀吉政权与琉球之间的政治交涉,肇始于日本重新统一后不久的1589年。此后展开的这一琉、日交涉,形势对琉球极为不利,它被要求参加日本侵略大陆的军事行动,并向日方提供其侵略所需的部分军粮。^②但是,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与明朝紧密相倚的朝贡属国,琉球无疑受到了更多来自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其政治立场更为倾向于明朝。早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爆发前夜,琉球王国政府就曾主动向明朝汇报日本的侵略动机。此后,琉球国正式加入到明朝的对日情报体系之中,成为明朝对日情报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琉球在明朝对日情报活动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所提供的日本情报对明朝对日本的认识和对日战略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③

再如,这场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影响到了当时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战争爆发前夜的万历十九年(1591)十一月,明朝的两广总督刘继文为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曾向万历皇帝提议以重金悬购丰臣秀吉首级。刘继文将目光投向当时已经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建议以重金赏赐为条件,诱使葡萄牙人出兵征讨日本,擒斩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④刘继文的提议得到了万历

① 王臻:《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138~142页。于晓光:《“以夷制夷”与“以倭攻胡”——壬辰战争期间明朝与朝鲜对女真政策的比较研究》,《潍坊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纸屋敦之:《亀井琉球守》,收入纸屋敦之《幕藩制国家的琉球支配》,校仓书房,1990,第120~121、124~125页;赤岭守:《琉球国—东アジアのコーナーストーン》,讲谈社,2004,第86~87页。

③ 关于16世纪末期琉球国向明朝所提供的日本情报,以往的研究颇多提及。如宫田俊彦:《琉明·琉清交涉史的研究》,东京,文献出版社,1996,第204页;丰见山和行:《琉球国の外交と王权》,吉川弘文馆,2004,第156页;沈玉慧:《琉球情报传递角色之形成及建立——以明清时期中日间的往来交涉为中心》,收入中琉历史会议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第十届中琉历史关系学术会议论文集》,2007,第168~169页。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研究,可参看郑洁西《一六世纪末明朝的对日本情报システム的一环となった琉球国》,《南岛史学》2010年第75、76合并号。

④ 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前夜明朝对日本的攻守战略》,收入张伟主编《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第三辑,海洋出版社,2009,第20~29页。

皇帝的允准，但现有史籍未见明廷或两广地方政府与葡萄牙人交涉的相关记载。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否响应了明朝的征讨日本号召尚未可知。不过，随葡萄牙人来到东方的一部分黑奴后来被编入明朝军队，并参加了明朝的对日作战。^① 此外，作为明朝军队的构成要素参加朝鲜战争的还有来自琉球、暹罗、东南亚其他国家、印度乃至日本的各国士兵。^② 当时的朝鲜战场呈现了颇为浓烈的国际色彩。

再有甚者，这场发生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冲突，其影响还波及遥远的暹罗（今泰国）。战争爆发后不久，作为援助朝鲜的一个重要战略，在当时的明朝朝廷中出现了动用暹罗国军力征讨日本的议案（以下统称为“借兵暹罗”议案）。关于该议案，较早在研究中有所提及的有日本学者中村荣孝等人。中村氏根据当时明人沈德符所撰的《万历野获编》以及后世学者谈迁所编的《国榷》两书中的相关记载，概括“借兵暹罗”情况为“在明朝，兵部尚书石星焦虑之余，悬赏公募恢复朝鲜之策。时建白之书满公车，其中采纳了程鹏起发暹罗兵征讨日本之策和沈惟敬以游说为名侦探倭情虚实之策。前者未得实现。”^③ 而关于这一“借兵暹罗”议案的具体研究，或当以笔者多年前的硕士论文《“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罗”之研究》^④ 为肇创。在该论文中，笔者分“‘借兵暹罗’之策的提出”、“廷臣疆吏之反应”、“明朝的恭顺属国暹罗”、“借兵战略之实施经纬”、“朝鲜战场上暹罗出兵的信息流布”、“‘借兵暹罗’战略终止的原因”六章，较为详尽地探讨了“借兵暹罗”战略的整体情况。笔者后来又对该文作了大幅修订，将之精简为《万历二十年の「暹罗参战案」考》一章收入了博士论文《明代万历时期の中日关系史の研究》^⑤。此后，日本东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木村可

① 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明军中的外国兵》，收于耿昇、刘凤鸣、张守禄主编《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第357～359页。

② 参见丸龟金作《文禄庆長の役と南方人种の海鬼に就いて》，《历史学研究》第103号，岩波书店，1942，第56～60页；李铉淙：《壬辰の倭乱と東南アジア人の来援——大明軍の構成員として動員された琉球・シャム・インド軍の参战记录》，《アジア公论》1975年第29期；郑洁西：《万历朝鲜役により明軍に編入された日本兵》，《東アジア文化环流》第1编第2号，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2008，第149～167页。

③ 中村荣孝：《日鲜关系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9，第164页。

④ 郑洁西：《“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罗”之研究》，2006年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76页。

⑤ 郑洁西：《明代万历时期の中日关系史の研究》第二编第三章《万历二十年の「暹罗参战案」考》，2010年日本关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奈子于2010年12月发表论文《明の对外政策と冊封国暹罗——万历朝鲜役における借暹罗兵论を手掛かりに——》^①，亦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借兵暹罗”提案经纬等情况作了考察，并探讨了当时的明暹两国关系。

拙稿立足笔者先年的研究成果，全面考察了万历二十年明朝“借兵暹罗”征讨日本议案的诸多相关问题，在还原这一历史个案的基础上重新探讨这场战争所引起的整个亚洲世界的联动情况。

二 “借兵暹罗”议案的提出

关于“借兵暹罗”议案的提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版本。

（一）“妄男子”程鹏起的“借兵暹罗”说

日本学者中村荣孝在其《日鲜关系史の研究》中明指“借兵暹罗”议案的提出者为程鹏起。^②其主要根据是明人沈德符所撰的《万历野获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三十五年（1606、1607）]。《万历野获编》中有关于程鹏起提出“借兵暹罗”议案的详细记载。为论述方便起见，今摘录其相关内容如下：

关白侵朝鲜事起，建白者章满公车。石司马以集众思为名，多所采纳。……有一妄男子程鹏起者，求往海外暹罗国借兵以攻关白，可令回师自救，以解朝鲜之困。石司马大喜，以为奇策，即请于上，加参将职衔，给饷招募。其寮掾二十人，皆无赖椎埋辈也，并授指挥，充中军旗鼓等官，[A]先入朝鲜，约会师之期，索其赂数万，[B]至闽广造船募兵，费饷数十万，俱匿入橐中，盘桓海上不发，始为言者论罢辍行。后石得罪，田东洲乐秉中枢，捕程笞数十，论戍，逃归，至今往来南北，携数十女优及恶少数辈，遇豪家即令演剧，以博缠头，间有挑之者，旋使荐枕，连宵阅日，恬不知耻。又遍拜荐绅名公，称弟子。余尝遇之广坐中，历指其扮戏诸妇曰：“此为邹尔瞻老师所爱，此为顾叔时

① 木村可奈子：《明の对外政策と冊封国暹罗——万历朝鲜役における借暹罗兵论を手掛かりに——》，东洋文库和文纪要：《东洋学报》第92卷第3号2010，第29～58页。

② 中村荣孝：《日鲜关系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9，第164页。

老师所赏。”以一漏网健儿，污蔑贤者至此，而荐绅先生无一呵叱之者，异哉。^①（[A]、[B]为笔者所添加的次序符号，下同）

又，《万历野获编》卷十七《兵部·暹罗》中亦有如下一段相关记载：

倭事起时，有无赖程鹏起者，诡欲招致暹罗，举兵捣其巢，以纾朝鲜之急，其说甚诞，一时过计者，又恐暹罗入境窥我虚实，且蹂践中华。于谷峰宗伯，时在春曹，极讪笑之，以为茫茫大海，不知暹罗在何方，所云调征者已可笑，乃又忧其入内地，此待其来时再议之可也。其言似是。然暹罗实与云南徼外蛮，莫及缅甸相邻，陈中丞用宾抚滇，尝欲与协力图缅，夷为郡县，可得地数千里，事虽无成，然其国滨海，而可以陆路通无疑矣。程鹏起泛海求援，固属说梦，即于公讥诋，亦未得肯綮。于久为礼官，暹罗为入贡恭顺之国，其道里图经，何以尚未深究。^②

据以上《万历野获编》引文可知，在日本侵略朝鲜的危急之际，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向朝野广集众智，其中“妄男子”程鹏起所提出来的“借兵暹罗”议案因颇有“奇策”之誉而为石星所采纳。程鹏起提议遣人赴海外之国暹罗借兵以攻丰臣秀吉（中国文献多称“关白”），借之纾救朝鲜国难。石星以为“奇策”，当即采纳。提议者程鹏起亦因建言之功而被授予“参将”要职，并被委以[A]联络朝鲜和[B]赴闽广造船的重任，但其最终却一无所成。《万历野获编》称程鹏起的“借兵暹罗”提案在朝廷中引起颇多争议，礼部尚书于慎行即明言其策绝难实行。

中村荣孝等人所介绍的程鹏起“借兵暹罗”议案，其主要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但是，当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沈德符还是年仅十岁的总角少年，其活动场所则在其故乡浙江嘉兴府下的属县秀水，亦远离当时的政治和信息中心北京。成书于十余年后的《万历野获编》中关于程鹏起的记录，绝非事件发生当时沈德符本人的亲身实录，只不过是他在成年之后通过后来的传闻对这一事件所作的一段追记。相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程鹏起》，中华书局，1959，第438~439页。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暹罗》，第439页。

对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当时的礼部尚书于慎行亦留下一部著作《谷山笔尘》，其中的相关记录恐怕要更为接近流播于当时社会的相关传闻。

于慎行在战争爆发前夜的万历十九年九月致仕，其时已经回到故里山东东阿县。^①翌年，当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爆发之时，一名与之相识的朝中高官恰巧路过东阿，顺道拜望了于慎行。两人在交谈中提到了流播于当时社会的这个热门话题——明廷的“借兵暹罗”议案。于慎行在其后所著的《谷山笔尘》中述当时情形如下：

万历壬辰，倭寇朝鲜，朝廷遣兵援，恐其不胜，欲调播酋杨应龙兵东救朝鲜。又听一妄男子上言，欲发暹罗之兵，使由海道捣其巢穴，庙堂以为奇策，识者闻之无不骇笑。播酋不奉汉法，阻兵拒命，朝廷遣使即讯，数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调其甲士出入中土，窥见虚实，纵使有功，何以善后，此岂制播酋之方。至于暹罗小国，僻在海南，日本视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捣其国都，是以螻蟻入鼎也。匪独如此，纵使播酋恭顺，暹罗盛强，势亦不能。何也？由蜀至辽，一经两海，水土不习，强弱亦异，而暹罗小国，乃在占城之南，琉球之西，三十余年不通朝贡，使者佩虎符而往，将安问津，况能发其兵乎？此等见解，如醉如痴，谋国若斯，不败何为？国家福德，天实默佑，非人力也。方议调兵时，有一当路过东，驻车相访，语次叹曰：“暹罗可调否？恐其兵入中国，多所蹂践，奈何？”予笑应曰：“暹罗知在何方，取得来再虑未迟。”此公亦未披舆图，不知暹罗所在也。因忆唐元稹为宰相，会成德王廷凑反，围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不能解，乃用于方计，遣客间说贼党，使出元翼，又赂吏兵令史，伪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给赐，事闻，稹遂罢相。此政与遣程鹏举覓兵暹罗事类。^②

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记述略有出入，于慎行《谷山笔尘》记“借兵暹罗”议案的提出者为“程鹏举”而非“程鹏起”。当时于慎行已经从礼部尚书这一要职引退，其所听闻的“借兵暹罗”之说，恐怕并非直接

① 《明神宗实录》卷 240，万历十九年九月戊寅（十六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第 4466 页。

② 于慎行：《谷山笔尘》卷 11《筹边》，明万历于纬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112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792～793 页。

传自北京朝廷，很有可能来自当时的民间传闻。对于当时的“借兵暹罗”议案，于慎行提出了自己的两点看法：其一，暹罗为小国，绝非日本敌手；其二，明朝虽欲动用暹罗海军，但其事绝难实行。关于后者，于慎行提出如下三条理由：第一，暹罗距离明朝太远，其军难适中原风土；第二，暹罗三十余年未通朝贡，未必肯响应明朝号召；第三，明朝使者不明暹罗道里。

然而，于慎行虽曾为司掌外交事务的礼部长官，但其却并不以精通海外事宜见长。沈德符称于慎行虽然“久为礼官”，但对暹罗“为人贡恭顺之国”以及暹罗的“道里图经”都“尚未深究”，认为他的看法“未得肯綮”。^① 另外，被于慎行看做是区区小国的暹罗，其实际上是当时崛起于东南亚世界的一个新兴强国。^② 这一情况在当时就已经渐为明人所知，譬如其时的云南巡抚陈用宾就曾尝试联手暹罗征讨敌对的军事强国缅甸。^③ 而关于暹罗称雄东南亚之事，时人张燮在其著作《东西洋考》卷二《西洋列国考·暹罗》中则有如下一段相关记述：

隆庆初年，东蛮牛（俗名放沙）求婚暹罗，暹罗拒之峻，东蛮牛恚甚，统沙外兵围暹罗，破之，王自经死，虏其世子及中朝所赐印以归。次子摄国，奉表请印，曰：“暹罗部领数十国，非天朝印不得调兵。”上命给予。……暹罗既败，其后颇为东蛮牛所制，嗣王整兵经武，志在复仇。万历间，东蛮牛复来寇，嗣王引兵迎击之，杀其子，东蛮牛宵遁，不敢复窥暹罗，暹罗新雄海外，随移军攻真蜡，真蜡降，从此年年用兵，遂霸诸国矣。^④

据上引文可知，暹罗在隆庆年间曾一度惨败于东蛮牛（即缅甸的东吁王朝），但暹罗嗣王（纳黎萱大帝）励精图治，后来在万历年间大破敌国，终复其仇，并且进而出兵降伏了真腊（今柬埔寨）。此后的暹罗国不断侵伐周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暹罗》，中华书局，1959，第439页。

② 吴迪（W. A. R. Wood）著、陈礼颂译《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第九章《阿瑜陀耶皇朝第十七代君摩诃县罗阁皇本纪》、第十章《阿瑜陀耶皇朝第十八代君纳黎萱大帝本纪》，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第138~168页。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暹罗》，第439页。

④ 张燮：《东西洋考》卷2《西洋列国考·暹罗》，中华书局，1981，第33~34页。

边诸国，遂称霸东南亚。

此外，关于暹罗和明朝的朝贡关系，于慎行的见解也并不准确。有明一代，暹罗为明朝最忠顺的臣属国之一，这一观点已为学界共识，^①兹不复赘。单以当时的朝贡情况来看，仅万历朝前期，暹罗向明朝的朝贡活动，就有万历元年（1573）、万历三年（1575）、万历十年（1582）、万历二十年（1592）四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万历七年（1579），明朝在外语翻译机构四夷馆中增设“暹罗馆”，招聘 18 名来自暹罗的使者和通事入馆教习暹罗的金叶表文，这既归因于当时明暹两国的频繁往来，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②

再者，于慎行所提出的明朝使者不明暹罗道里的情况，其实也是不明就里之辞。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暹罗的使者刚好来到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朝贡。决定“借兵暹罗”的万历皇帝在暹使贡毕回国之际，特地派遣自己的使者与暹使同行往赴暹罗交涉“借兵暹罗”事宜。

由上可知，无论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对后来传闻的追记，还是于慎行《谷山笔尘》中所记的当时传闻，两者在记述上都有不实之处。“借兵暹罗”其事，应当另有情形。

（二）暹罗使者的参战请求

关于“借兵暹罗”议案，明朝方面的正式记录，多以当时来到北京朝贡的暹罗使者为其提出者。其情形大致为，暹罗使者主动向明朝提出建议，请求允许其国参加对日作战，以其海军直捣日本本土。

譬如，万历朝的实录《明神宗实录》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辛酉（六日）条中就提到了暹罗使者自请出兵的情况：

总督两广都御史萧彦奏，暹罗居极西，去日本万余里，近有贡使请

① 何爱国：《明代中泰外交关系研究》，2002 年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文德：《从暹罗馆的设立看明朝后期与暹罗的文化交流》，《东南亚纵横》2009 年第 11 期；汤开建：《万历四十五年田生金〈报暹罗国进贡疏〉研究——明代中暹关系史上的一份重要的中文文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7 期；汤开建：《明清时期华人向暹罗的移民》，《世界民族》2006 年第 6 期；曲明东：《试论明朝与暹罗的关系》，《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② 张文德：《从暹罗馆的设立看明朝后期与暹罗的文化交流》，《东南亚纵横》2009 年第 11 期。

于兵部，愿效勤王。兵部覆令发兵直捣日本。……^①

两广总督萧彦根据兵部的令文，得知了暹罗的朝贡使者向兵部提议本国出兵直捣日本巢穴的请求。

又如，朝鲜王朝的实录《宣祖实录》在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十二月甲午（八日）条中亦记录了当时最早传到朝鲜的“借兵暹罗”的相关情况：

（郑）昆寿曰：“暹罗使臣到上国，上本请救朝鲜。天朝准其请。故明春当发兵往征日本云矣。”上曰：“日本，元世祖所不能讨，暹罗何能为。”友胜曰：“暹罗虽易言之，岂能讨乎。”^②

郑昆寿于万历二十年八月末作为“请兵陈奏使”被派往北京，他在同年九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至十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为止，郑昆寿在北京逗留一月有余。^③与郑昆寿同时滞留北京的外国使者，还有暹罗的朝贡使者。^④郑昆寿回到朝鲜后，马上向朝鲜国王李昞汇报了“暹罗使臣到上国，上本请救朝鲜”这一最新国际新闻。郑昆寿在逗留北京期间，刚好经历了暹罗使者请求出兵参加对日战争、明廷决定“借兵暹罗”的这一连续事件。

此外，暹罗使者提出、万历皇帝采纳的“借兵暹罗”方案，经由朝廷的官报——邸报的发行，很久就传播至全国各个要地。该年十一月初二日，两广总督萧彦就接到了这封邸报。这封邸报未能流传下来，但其中的部分内容可在萧彦后来的奏折中窥见一斑：

① 《明神宗实录》卷256，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辛酉（六日）条，第4752页。

② 《宣祖实录》（《李朝实录》第27册）卷33，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甲午（八日）条，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第421页。

③ 武晓燕：《明朝出兵援朝抗倭与朝鲜使者郑昆寿——读〈韩国文集丛刊·柏谷集〉札记》，《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4卷第4期。

④ 《明神宗实录》卷252，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癸未（二十七日）条有“宴暹罗国进贡陪臣，命侍郎范谦待”（第4701页）的记录，另外同书卷253，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己亥（十三日）条有“暹罗国夷使二十七员赴京进贡，给赏冠带如例”（第4710页）的记录。据此可知，万历二十年（1592）九、十月间暹罗的朝贡使者与朝鲜使者郑昆寿同在北京逗留。

臣待罪海邦，本年十一月初二日接阅邸报，该兵部一本，奏称暹罗夷使自愿出兵剿倭缘由。奉圣旨：据夷使所称，具见忠义，然事关重大，还行与两广总督，着移文另选一能事官员，与原差官并夷使同往彼国，宣谕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颁敕举事。余应行者，俱依拟。钦此钦遵。^①

与邸报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的另外一份记录是时人王圻所著的《续文献通考》。这部刊行于战争结束后不久的巨著对“借兵暹罗”议案的提出、实施情况有如下记述：

万历二十年九月，经略侍郎宋应昌奏暹罗国正使握叭喇等愿督兵荡剿倭巢。奉旨：夷使所称，具见忠义，事关重大，还行与两广总督，着移文另选一能事官员，与原差官并夷使同往彼国，宣谕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颁敕举事。^②

据以上各种正式记录可知，明朝“借兵暹罗”起因于暹罗使者“握叭喇”提出的暹罗出兵参战请求。“握叭喇”所提出的这一请求，由当年九月刚刚被任命为蓟、辽、保定、山东四省“防海御倭军务”^③经略大臣的宋应昌以奏折形式向万历皇帝作了汇报，结果得到了采纳。

在采纳暹罗使者所提出的参战请求后，万历皇帝为实现这一“借兵暹罗”战略方案，亲自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

关于“借兵暹罗”方案的实施步骤情况，上引邸报以及《续文献通考》中均有“还行与两广总督，着移文另选一能事官员，与原差官并夷使同往彼国，宣谕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颁敕举事”这一同样内容。由此可知，万历皇帝制定的实施战略分为以下六个步骤。（1）在北京派遣使者“原差官”，命其与朝贡后回国的暹罗使者同行往赴暹罗交涉；（2）派遣

① 萧彦：《制府疏草》卷下《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见《丛书集成初编》910册，中华书局，1985，第30页。

②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36《四裔考·暹罗》，万历三十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79页。

③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敕兵部右侍郎宋应昌”，明万历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8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6页。

“原差官”后，又命两广总督挑选堪与暹罗交涉的合适人选“一能事官员”，令其待机于两广；（3）当来自北京的“原差官”与暹罗使者到达两广时，两广总督选一“能事官员”与之共赴暹罗；（4）明朝使者到达暹罗国之后，向暹罗国王颁告明朝动员其出兵参战的命令；（5）如若暹罗国王响应明朝的动员号召，明朝使者则将暹罗国王所作返简“回文”持归北京复命；（6）如果以上诸步骤均得到顺利实施，收到暹罗国王“回文”的万历帝将颁布诏书，正式命令暹罗国出动海军直捣日本。

万历二十年十一月，27名暹罗使者在北京接受了明朝朝廷赏赐的冠带（明朝官员的服饰），但是此后再无关于这批使者的任何相关记录。^①暹罗使者恐怕在当天即回国复命。而由明朝派遣的交涉使者“原差官”，则很可能在当时就与暹罗使者一道踏上南下归途。

三 两广总督萧彦反对“借兵暹罗” 与议案中止

（一）萧彦上奏

明廷采纳“借兵暹罗”议案后不久，相关信息经由朝廷官报——邸报的发行，迅速传播至全国各个要地。这一信息，在接近暹罗的两广地区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两广总督萧彦的奏折“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就明显地反映了两广地区对“借兵暹罗”战略实施的极为不安心态。

作为“借兵暹罗”战略在实施上的一名重要参与者，两广总督萧彦在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接到了相关的邸报。萧彦仔细听取了两广地方的社会舆论，在全盘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之后，向万历皇帝呈上奏折“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建议中止这一战略的实施。萧彦的奏折见录于其所编纂的奏折集《制府疏草》中。为论述方便起见，兹摘录该道奏折全文如下：

[A] 题为夷心难测，借兵宜慎，恳乞圣明覆行酌议，以销隐忧，以图万全事。

^① 《明神宗实录》卷253，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己亥（十三日），第4710页。

[B] 臣待罪海邦，本年十一月初二日接阅邸报，该兵部一本，奏称暹罗夷使自愿出兵剿倭缘由。奉圣旨：据夷使所称，具见忠义，然事关重大，还行与两广总督，着移文另选一能事官员，与原差官并夷使同往彼国，宣谕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颁敕举事。余应行者，俱依拟。钦此钦遵。已经通行司道将领等官，一面选委听候外，[C] 臣惟时事多故，岛夷告急，此皇上宵旰之辰，正臣子捐糜之日，乃暹罗夷使，以助兵请于兵部，兵部亟以闻，而皇上允之。盖譬之医然，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今固其治标时也。倘可藉此灭倭，岂惟纾目前之患，抑亦彰一统之盛，夫复何言。然而暹罗地图，粤人得之最真，暹罗情形，粤人知之最悉。近自闻报以来，粤中士庶，皇皇偶语，不胜杞忧。而司道等官，亦皆啧啧言之。[D] 臣叨守封疆，若复以言为讳，异日不幸如粤人所虑，臣身不足恤，如国事何。用敢陈其状，而皇上试矜而察焉。[D1] 查得暹罗居极西，与滇南相对，日本居极东，与吴越相对，约相去一万一千余里。而界其中者，有安南、占城、满喇加、吕宋、琉球等国在焉。暹罗之于日本，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暹罗虽世守臣贡乎嘉隆之间，久以愆期。至万历元年而始贡，十九年而再贡。彼其于中国，又非素效忠诚如朝鲜比也，乃欲悉其夷兵，越人之国，以犯兵法之所甚忌，而为我中国效力，不亦难乎。臣窃度，夷使之告，出夷使口耳，其国王之心不可知。即夷使之告，又或出各通事有志功名者意耳。其夷使之心不可知，万一我不能必之夷使，夷使不能必之国王，将令而不从，赏而不为，意不以道远为词，则以风恶为解，勿乃徒示中国弱，生四夷心乎。然此犹无害也。[D2] 周以狄伐郑，而狄卒病周，唐以回纥制胡，而回纥卒病唐。若通金伐辽，通元伐金，宋之覆辙，尤有不忍言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自古而患之。今天下固全盛时也，以天下之力，御此岛夷，似无甚难，而乃欲借兵暹罗。臣闻暹罗之强，不减日本，其狡又不减日本，而技稍让之。以水战，则日本不敌暹罗之舟，以陆战，则暹罗不敌日本之技。藉令暹罗果提兵而往，万一不利，必且请援于我，将拒之耶，彼固有辞。抑援之耶，则力又不给。是未收日本之功，而先构暹罗之衅也。是两树之敌也。又藉今往而利也，而果能纾我一时急也。周臣有言，报者倦矣，施者未已。彼又且挟己之功，轻我之备，以为中国无如日本何，其如暹罗何。臣恐异日之忧，不在日本，而在暹罗也。然此犹可图也。[D3] 至于地方之

忧,如粵人所皇皇者,臣又尝筹之。查得由暹罗至日本,皆海也,计必用舟师,而其用舟师也,先之廉、雷、琼、高,继之香山、东莞、广州、惠、潮,达于漳、福、台、宁,而后抵日本,盖中国靡丽之地,无一不历之,而粤固首当其冲者也。彼其奉檄而来,舳舻蔽空,势必要我粮餉,而数且无定,责我赏劳,而欲且无厌,闯入我郊关,其谁禁之,蹂践我百姓,其谁敌之。盖狼、土之兵,所过为墟,况暹罗哉。而况奉天朝之命,以纾天朝之急,又何惮不为哉。我问之,则曰为中国来也。不问之,又恐其有他变也。[D4]且滨海奸人,出入夷邦,包藏祸心者,实繁有徒,一见夷兵之报,彼且投入其中,多方拨置,而广之香山,又业有濠镜澳在焉,不知始是何年,生此厉阶,迨至于今,窃据海上,不下万众,几于尾大不掉,其所恃为羁縻者,特目前市舶利耳。而犬羊之性,终不可测,其人则又皆暹罗、佛朗机、满喇咖诸国之夷,而中国亡命间亦有之,譬之麀附颈,留之不可,去之不能,则此类是也。暹罗渡海,必将出于其途,万一戎心叵测,而闽广之人,积奸巨猾,若曩时之曾一本、林道乾者,又潜为之主,彼且借一衅端,突然而起,入吐蕃劫盟故智,以直入广,广不可为矣。又不然,而或存留多夷于中,若曩时之俺答所以祸西宁者然,异日之害,亦宁有已时哉。而闽越勿论矣。大都暹罗之兵,背约而不出,则损我国体,而其为害也小,如约而出,则无益于国事,而其为害也大。[D5]臣又计之,暹罗即诚心助兵,亦安能空国而行。多则三五千,少则二三千,聊以应我之命,而索我之赏耳。[E]方今以全盛之天下,朝廷诚下一尺之诏,闽募若干,广募若干,浙募若干,即万兵可以立致,而时当有事,人人思奋,即统万兵,宁患无人。又奚必借力于暹罗,而自见弱,且貽患也。况夷使久住京师,辽左告急之状,闻且见之,而我复借兵于彼,益示之弱耳,安知暹罗不有如关白者乎。又安知异日者不有所侮而动乎。虽万万无此,然不可不为之虑也。而或曰,以夷攻夷,古称上策,何虑之与有。臣则谓,以夷攻夷,惟平时行之可也,操纵在我也。事急借兵,而拟之以夷攻夷,不类矣。该部之见,岂其遂不及此,而华夷地隔,既限于不及知,忠爱心切,又迫于不暇悉,故止谓暹罗止助兵也,而不意其兵之必由海也,不意其由海而广,而闽越也。不然,虽暹罗百请,而肯从之哉。[F]臣非不知事在燃眉,计不旋踵,而揆之愚衷,参之闻见,以为借夷兵必无益,而用夷兵且有害,近之则害先于粤东,而究之则忧貽

于国家，故敢昧死以陈，伏乞敕下兵部，查果臣言有据，覆议上请，亟寝前议，以图万全。其防剿倭夷，万一兵力不足，或酌行各省，定以名数，选一能将，募送阙下，惟皇上用之，何患乎岛夷，何资乎暹罗，将海波可靖，而太平无疆矣。臣不任战惕待命之至。^①

分析上述萧彦所呈奏折，可将其内容概括为以下几点：

[A] 奏折的全名为“为夷心难测，借兵宜慎，恳乞圣明覆行酌议，以销隐忧，以图万全事”。萧彦认为，暹罗虽然自请出兵参战，但其本心实属难测，建议朝廷慎行。

[B] 萧彦接到朝廷的邸报之后即迅速行动，执行朝廷指令，已经挑选好与暹罗交涉的合适人选，整装待命。

[C] 然而，两广地区对“借兵暹罗”的舆论，却无赞成倾向。官员百姓都有强烈的反对意向，消息给地方带来极大不安。

[D] 鉴于两广地区的社会舆论，萧彦上奏反对“借兵暹罗”理由如下：

[D1] 动用暹罗出兵参战实属不易。暹罗既离中土太远，又难保其绝对忠诚于明朝。暹罗使者的提议，不一定能代表暹罗国王的意向，暹罗使者所提出的暹罗出兵参战方案，亦未必能够得到暹罗国王的认可。

[D2] 暹罗本身对明朝存在着巨大的威胁。暹罗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在其与日本交战之后，难保其不会萌生日本那般的侵略野心。萧彦担心明朝的日后敌手，“不在日本，而在暹罗”。

[D3] 如若实施“借兵暹罗”，则易生地方之忧。暹军为海外之兵，其军必定无纪，“借兵暹罗”战略之实施，必然招致两广、福建、浙江诸省的地方之忧。

[D4] “借兵暹罗”易招致国家日后的灾难。“滨海奸人”、“中国亡命”以及“濠镜澳”，即明朝沿海地区的不法之徒、亡命者以及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借兵暹罗”的实施为契机，参与其中，挑拨明暹两国关系，谋占两广、福建诸地，这会招致国家的“异日之害”。

[D5] 暹罗的本心，恐怕仅在谋求明朝的恩赏。暹罗即使能够响应明朝的参战号召，其不可能动用全国兵力参战自在当然。暹罗使者提议暹罗出兵

① 萧彦：《制府疏草》卷下《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第30~33页。

参战,其目的当不过为“索我之赏”。

[E] 萧彦最后指出,时当明朝全盛之期,仅国内招募亦能保证兵力充足,没有必要动用暹罗的军力。而于危急之时借兵外国,是示本国之弱,而贻他日之害,可为深虑。

萧彦权衡利弊,反对“借兵暹罗”。

(二) 中止“借兵暹罗”

因为记载的阙如,萧彦“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一疏的提出时间不得其详。不过,萧彦的这封奏折在呈上之后不久就得到了来自朝廷的反馈。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朝廷正式作出决议,基本上采纳了萧彦的提议。《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辛酉(六日)条有如下的相关记录:

[A] 总督两广都御史萧彦奏,暹罗居极西,去日本万余里,近有贡使请于兵部,愿效勤王,兵部覆令发兵直捣日本。又念海道旷远,夷心叵测,要行停请。[B] 兵部议:[B1] 关白以贼厮篡夺,淫虐奸狡,凭陵诸国,今复占据朝鲜,潜图内犯,致虞王师。乃暹罗贡使愤兹不道,既效勤王之忠,亦为笃恤邻之义。臣等特为请遣,一以风厉远邦,一以牵制倭众。盖兵家固有多方以误之者,初非以堂堂中国,恃兹岛夷之力为也。明旨既嘉其忠义,又重其事机,必待督臣酌议,取彼回文,方可颁敕。深识远见,隐然具在。[B2] 今督臣坐镇炎荒,海邦机宜,悉如指掌,[B3] 合令查照题议事理,将本部差去号召官员悉听酌量行止,如已达彼国,即便责差忠勇通官传檄宣谕暹罗国王遵照明旨,整饬舟师。回文奏报,另听敕书至日遵行。[C] 从之。^①

分析这则记录,可概括出如下的几点:

[A] 为建议中止“借兵暹罗”战略的两广总督萧彦奏文的概括。

[B] 针对萧彦的奏折,兵部经过重新考虑,最终调整了相关部署。其具体内容分为以下三点。[B1] “借兵暹罗”起因于暹罗使者的提议,兵部将之奏上万历皇帝,最终获得采纳,万历皇帝极为看重其事,亲自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B2] 两广总督萧彦熟悉海外事宜,兵部尊重他的

^① 《明神宗实录》卷256,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辛酉(六日)条,第4752~4753页。

意见。[B3] 鉴于萧彦的提议，兵部提出两点相关的处置建议：其一，原则上采纳萧彦的提议，迅速派遣一批新的使者，将原来派往暹罗的使者召回，中止“借兵暹罗”；其二，如果使者已经到达暹罗，则按原定计划实施。

[C] 万历皇帝采纳了兵部的上述提议。

据上可知，万历皇帝和兵部基本上采纳了萧彦提出的中止“借兵暹罗”建议。可以想见，此后明廷迅速派出一批新的使者南下，试图召回与暹罗使者同行赴暹的“号召官员”。但其具体情形，因为记载的阙如不得其详。而暹罗方面的档案资料中亦未见当时明朝“借兵暹罗”的相关记载。^① 与暹罗使者同行南下的明朝“号召官员”恐怕在抵达暹罗之前即被召回。

四 结语

爆发于万历二十年的日本侵略朝鲜战争，将明朝、朝鲜、日本这三个主要东亚国家卷入其中，作为东亚世界的一场重大“国际事件”，这场战争至少还影响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东海之外的琉球国、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甚至还波及遥远的暹罗。

本文考察了万历二十年明朝“借兵暹罗”征讨日本战略的提出、采用、实施、中止等诸多相关问题。当万历二十年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爆发之际，来自暹罗的朝贡使者恰好来到了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因为与明朝保持着极为友好的朝贡关系，暹罗使者主动向明朝提出了出兵征讨日本的请求。明朝极为重视暹罗使者的这一请求，决定“借兵暹罗”，进攻日本本土。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万历皇帝制定了颇为具体的实施步骤，并且迅速派遣使者随同暹使南下，远赴暹罗交涉借兵事宜。但是，两广总督萧彦却对“借兵暹罗”提出异议，上疏请求中止。万历皇帝和兵部重新考虑了“借兵暹罗”计划，基本上同意萧彦的提议。结果，“借兵暹罗”最终未能实施。

虽然万历二十年的“借兵暹罗”战略最终未能实现，但是，我们发现，早在 16 世纪末，伴随着亚洲内部的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的爆发，包括暹罗在内的，当时整个亚洲世界已经开始发生了整体上的联动。

① 吴迪 (W. A. R. Wood) 著、陈礼颂译《暹罗史 (A History of Siam)》第十章《阿瑜陀耶王朝第十八代君纳黎萱大帝本纪》，第 156 ~ 157 页。

Ming China's Plan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Siam to Mount a Naval Invasion of any of the Main Islands of Japan in 1592

Zheng Jiexi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16th century, Toyotomi Hideyoshi, the regent of Japan, led a newly unified Japan on two invasions of the Joseon Kingdom in Korea, known as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1592 -1598), with the professed goal of eventually conquering Ming Dynasty China. Though the Koreans were heavily defeated in the beginning, the Japanese troops did not reach beyond the peninsula, for the king of Korea required Ming, his suzerain state for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Ming Emperor Wanli sent his expeditionary forces to Korean peninsula later in 1592 to fight the Japanese troops. As a result, Korean peninsula became a battlefield for a larg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ong Ming China, Joseon Kingdom and Japan. However, much more people and states, such as the Jurchens who were living in Manchuria, the Portuguese who were living in Macau at that time, and the Ryukyu Kingdom and the Siam Kingdom, were involved in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For Ming China tried to carry out its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them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more effectively. Though it was not executed at last, Ming China's plan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Siam to mount a naval invasion of any of the main islands of Japan has a special meaning at that time.

Key Words: Ming Dynasty China; Toyotomi Hideyoshi; Joseon Kingdom; Ming China's plan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Siam to mount a naval invasion of any of the main islands of Japan; Xiao Yan

(责任编辑: 杨芹)